

司方维
／
著

认同与 解构

台湾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司方维
/ 著

认同与 解构

台湾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同与解构：台湾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研究 / 司方维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8

ISBN 978 - 7 - 5203 - 0398 - 9

I. ①认… II. ①司… III. ①女作家—文学作品研究—台湾—现代
②女作家—人物研究—台湾—现代 IV. ①I206. 7②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982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曹惠民

司方维博士的第一部个人专著《认同与解构——台湾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这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数年的修改充实而成的。看着方维发来的著作电子文档，自她最初介入台湾文学研究时起，十多年来的历历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

2005年，方维从她的老家山东考入苏州大学文学院攻读现当代文学的硕士学位，在确定专业方向时，她选择了台湾文学，于是我成了她的研究生导师。初识之下，她给人的印象是安静娴雅，相处日久，就会发现在她娴静的外表下，内蕴的却是执着与认真，她分明有着自己的追求与坚守。读硕期间，她阅读了大量台、港、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和相关的中外理论书籍，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她是一个不仅舍得用功读书的人，还很善于思考与专业研究、教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他们那届硕士进校的第二年，我基于几年的思考和准备，决定开设一门新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基础》，试图就研究生教学与培养摸索点新路径，对纠正研究生教学的本科化倾向、建构师生“互动”的教学新模式、撰写论文要加强对资料搜集的重视、要谨守学术规范、研究方法要多元以及学术研究要建立国际视野等都有一些思考与实践，课程最后还举办了模拟学术研讨会……此课结束之际，她对我做了个访谈，以师生对话、互动的形式，就这一课程的实践情况进行及时总结反思。她根据此次访谈录音整理出的文章《在“互动”中提升——导师与研究生的对话》，

刊发于2006年底的《苏州大学报》，引发了较多关注，对全校研究生教学与培养产生了相当好的影响。

读硕期间方维还发表了多篇论文，科研能力得以明显提升。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台湾乡土文学意象论》。在阅读了大量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后，她抓住了“意象”这个中心作为切入点，从审美的角度对台湾乡土文学展开了较为全面综合的考察与分析。论文择取牛车、火车、番薯、甘蔗、秤、枷、鲁冰花、“压不扁的玫瑰花”等物象，来深探台湾乡土文学作品所蕴蓄的文化、历史、心理、民俗等丰富内涵，从而对象繁意深的台湾乡土文学做出了新的解读，为乡土文学的研究拓展了新的思路，赢得了校内外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硕士毕业在即，她却向我表达了报考我博士的意愿，多少有点让我意外，因为在此前的接触中，她从未流露过这方面的想法，我自然也不会主动动员她考博（我历来的原则、习惯都是不主动招徕博士生源，而是守株待兔式地等人上门，鄙意以为这类决定事关重大，往往牵涉个人的多方面考虑，不宜由导师给予主导性意见）。考试结束，她的专业成绩在来自全国的近20名考生中拔得头筹，加之又有一定的科研成果，综合优势明显，成为我招收的第十届博士，也是我指导的最后一个博士。攻博三年，她在前三年研读台、港、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阅读面，同时深化由阅读而生的思考，视野更为开阔，问题意识更为强化，独立科研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而研究的方向仍然锁定在台湾文学，正应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目标始终如一”。

2010年3月，首次以“海外华文文学与诗学”为主题的“全国博士生论坛”在广州举行。该论坛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全国共有100多篇论文应征，来自18个省、市、自治区40多所高校研究生院（包括中国社科院及十多所“985”高校）和台、港、澳几所名校的60多位博士生、博士、博士后出席了论坛。方维从他们中间脱颖而出，被安排为大会报告人和分会场主持人之一。经专家盲审，她提交的论文

被论坛学术委员会终评委评为9篇获奖的优秀论文之一。接着还参加了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百余位学者出席的“华文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都使她增广了见识，也给了她很大的激励。

在苏大攻读硕博士期间，她多次协助我承办学术会议，接待来苏访问、讲学、交流的台湾、香港与旅居海外的华文作家及外国学者，在不卑不亢的得体应对中，于专业背景的了解上也受益颇多。她还曾自费专程造访国内台湾文学研究的重镇——厦大台湾研究院，看书、找资料、拜访请教著名专家（如刘登翰、朱双一先生等）。又两度应邀赴台，积累了亲身感受的台湾经验：先是以硕士生身份到台湾参加两岸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作大会发言，后又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到台北访学两个多月，为认真完成博士论文搜集了大量必需的原始资料。她的全情投入和勤奋得到了台湾老师和同学的一致肯定，她曾请益过的吕正惠、廖玉蕙、林于弘、陈信元等著名教授，都十分关注她的访学，给予了多方关照，还送了她不少很有价值的书刊，为她顺利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指点和支持。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对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的整体研究，利用这一难得的“在地”机会，她还访问了苏伟贞、朱天心、平路、袁琼琼四位著名外省第二代女作家，进行了相当充分的交谈（见本书附录）。作家们的口述实际上提供了不少别处无法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弥足珍贵，也使她对这一特殊的作家群体有了更多的“理解的同情”，为博士论文增色多多。在盲审中，论文获得了参与盲审的全国各地著名专家的高度肯定，答辩时也赢得校内外七位答辩委员的一致赞誉，一无争议地被评为“优秀”。姑苏六年，心无旁骛的她走得虽辛苦却收获丰硕，而老东吴的熏陶，又使她在坚执之外增添了几许灵动，历经磨炼，她正一步步走向成熟。

2010年起，我应邀参与南京大学吴俊教授（长江学者、研究生院副院长）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工作，承担台港澳与海外部分，作为项目成果之一，其间筹划《台湾文学研究35年（1979—2013）》一书的撰写。因交

稿时间紧迫，计划启动两年之后，我邀请方维加盟合作，其时她已到许昌学院任教，工作繁忙，且又进入南大博士后流动站（联系导师正是吴俊教授），进一步深造的压力也很大，但她毫不犹豫、一口答应，认真完成了她主要执笔的专题篇和学者篇等部分。其间，师生频频“意妙”（EMAIL）往还，切磋琢磨，配合默契，使该著得以在与江苏大学出版社合同商定的三年内（2015年12月）顺利完成并准时出版。此书承蒙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欣然赐序，先生在序中充分肯定：“《台湾文学研究35年》既是台湾文学研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创获。”对两位著者扎实的史料搜罗梳理工作尤其予以赞赏，并说“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的学者”。如今回首，一本书俨然成就了连接三代学人因缘承传的一则佳话，也为我几十年的学术生涯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美好记忆。方维也在与我的又一次互动、交集中，不仅对大陆35年来的台湾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有了更清晰的把握，而且对未来学术的发展也有了更为自信的前瞻。

钱谷融先生最有代表性的观念是“文学是人学”。我的理解，“人学”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学人”——从事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人”。研究成果固然重要，做研究的人本身的品位、素养、学风、德行，更是不容忽视。面对学界的浮躁、文坛的喧嚣，一个真正敬畏学术、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必须从容、淡定，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看着方维抱持着如此姿态一路走来的坚实脚印，我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欣慰。

故此，我不想太多评介方维这本书本身，读者诸君读后自有客观公允的评断。简言之，《认同与解构——台湾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研究》是一部论题集中、问题意识凸显、富有创意的扎实之作。它紧紧抓住“外省第二代女作家”这一特殊群体，提出了建基于大量史料梳理和作品细读前提下的个人见解，论述周延，切中肯綮，眷村的社会环境与言说语境，身份认同的多重面向与三维书写，都是颇具学理内涵的切入角度和诠释基点，彰显了论者的独到思维与独特解读。更难得的是，论者的观察与论说常带感情，无论是“理解

的同情”或“同情的理解”，都能让人感受到她面对充满心灵伤痛和历史创痕的话题，那颗善感之心的真挚关切。大陆和台湾两岸之间的文化渊源与深层连接，至为重要而研究不足，对此方维的考察和解读有自己的认知，未见得就是定论，但关于外省第二代女作家创作这一文学现象与大陆文脉的连接，其深入的思考具有学术性的探讨价值，其意义不言自明。当然，这一论题扩容乃至深化的空间也还是存在的。我以为，倘若能把外省第二代作家与第一代作家（以朱西宁等为代表）勾连起来作纵向解读，再把她们与同辈的外省籍男作家（如张大春、骆以军等）、本省籍女作家（如李昂、蔡素芬等）的双重关系作横向的比较考辨，进一步加强论述力度，如此拓开视野和格局，必然会有一些新的认知，在深度和广度的结合上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将具有深层解读的意义。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80后”的学术新人，方维的研究在某一个方面正代表了近十年来初涉学界的新一代学人的共同走向。而他们的走向将对以后数十年的相关研究影响至巨，不可小觑。就整体而言，三十多年来的台港文学研究无疑正拓开新局，新一代学人接受过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常就某一个专题进行新的垦拓，正昭告着大陆学院派的台港文学研究体制化的渐趋成形。议题的丰富与具体、方法的多元与适切，构成了新生代研究的醒目特征。无论是史论型、群体型、还是个案型……都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覆盖既广，钻探亦深。除了普遍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文本的解读（甚至细读）而外，他们还能够根据对象的差异，选择适切的研究方法，举凡社会学、心理分析、文化研究、主题研究、形象研究、文本批评、文学地理学、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在此一场域都找到了相当契合的用武之地。议题的具体、方法的多元，激活了研究的想象力与穿透力，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善于提出自创的论说概念，建构自足的论述框架。与坚实的史料梳理、深入的文本解读与适切的方法相伴生的，是见解的新颖与独到。研究水准的提升、研究局面的拓新，也就显现出新一代学人群体的奋进之势。学科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愿新一代学人能以敢于超越前行代学者

的心态和开阔的全球化学术视野，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学养和识见，从而引领新世纪的学术风潮，走向国际学术界的前沿。

方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值此再出发之际，我想将我衷心尊奉的八个字——“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赠予又将开启新征程的她。

相信她会喜欢，并一如既往地践行。

2016年10月28日于姑苏长岛

目 录

序	曹惠民(1)
引言	(1)
第一章 认同想象:以眷村书写为中心	(5)
第一节 眷村在文学中的位移	(6)
第二节 认同的多重面向及其流变	(11)
第三节 乡关何处:认同之危机	(24)
第二章 身份的建构与解构	(43)
第一节 在地认同	(43)
第二节 重现历史	(46)
第三节 祛魅政治	(68)
第三章 都市的多重魅影	(83)
第一节 都市:身份演练的新场域	(83)
第二节 都市文明的双重面貌	(92)
第三节 绝种的危机	(106)
第四章 女性身份的三维书写	(118)
第一节 第二性的泥沼	(119)
第二节 神性的救赎	(132)

第三节 人性的关怀	(141)
结论	(151)
附录一 台北访谈录	(157)
附录二 研究资料要目	(192)
主要参考文献	(232)
后记	(237)

引言

所谓“外省人”，主要指1945年后移民到台湾的大陆居民，尤以1949年跟随国民党迁台的军队及其眷属、公务人员及一般民众为大宗，共计约120万人。虽然只占台湾总人口的13%左右，但短期内大量移民的涌入还是极大冲击了台湾的社会环境。本就有先来后到之别，再加上虽然同为中国人，都是移民，但这些过百万的新移民来自天南海北，与已迁台几代落地生根的早期移民相比，地域文化差异明显；尤其是军队及其眷属，因为军队的特殊管理制度，自成一体，与本地人之间没有太多交流。主观上，新移民早期又普遍带着过渡心态暂居，自然而然就与早期移民区隔开来。“外省人”这一概念，本是当时国民党当局用来区隔这些新移民与早期移民的。“外省”是相对于“本省”而言，本只是一个省籍的概念，但因为被日本殖民历史造成的台湾人的亚洲孤儿心态，国民党当局在台政策又确实倾向于外省人，省籍矛盾在集权统治下虽隐而不显，却已埋下隐患。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党外势力及民进党的崛起，台湾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不同政治势力为了获取政治资源开始人为撕裂族群，无限放大族群之间的差异，省籍矛盾全面爆发，并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外省人”此时成为一个带有很多负面评价的贬义词，被“本省人”排斥甚至敌视。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民进党神话终结后，台湾民众多已能客观理智地看待省籍矛盾，省籍身份的政治意味日益淡化。

“外省人”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附着着不同的衍生物，在历史的演进中，既沾染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

文化群体。外省人在与大陆、台湾不同层面的多重关系中衍生出独特、复杂的面相与气质，他们在政治攻防、社会转型等多重合力拉扯下的艰难身份建构是非常有价值的话题。

现今，外省第一代已日渐凋零，外省第二代也步入中年渐入老年。而随着不同族群间通婚增多及父系概念的淡化而来的族群融合，致使族群分界必将模糊难辨，再加上族群观念的日益淡薄，外省第三代、第四代的淡出已是必然。作为过渡者的第二代，其身份书写与外省第一代作家相比，与同世代的本省作家相比，都有其独特之处，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台湾文坛的很多重要作家诸如苏伟贞、朱天文、张大春、朱天心、平路、袁琼琼、骆以军、郝誉翔等，都属于外省第二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其文学创作已成为台湾文坛不可小觑的成绩。在国民党威权崩溃、“本土论述”兴盛的大环境下，其书写虽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但又不限于族群身份所带来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是以其扎实丰富的文学成就成为文学多元版图中的瑰宝。

当然，外省人“代”的划分，并不能一刀切个干净明白，其中有很多复杂的情况。一般来说，习惯将1945年后赴台的那一代人称为第一代，其子女辈则为第二代。但是这一批赴台的人并不是整齐划一，年纪差距颇大。正值青壮年的一批人处于群体的核心部分，比如朱西宁、姜贵、王蓝、周梦蝶等军中作家，划属外省第一代是没有疑问的。但年老（还有少数祖辈亦跟随赴台）或年少的则处于概念边缘的模糊部分，三者混在一起便有辈分的尴尬。外省人的子辈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在台湾出生的争议最少，婴幼儿时期跟随父亲迁台的也较少争议，因为年纪尚小对老乡生活无记忆或记忆不深，与到台湾后才出生的“弟弟”和“妹妹”相比成长经验差异不大。还有一些复杂情况，比如白先勇是1948年迁居香港，1952年移居台湾，到台湾时虽未成年却已有15岁，与一些军队中的小兵（这些小兵因为只身赴台只能成为“第一代”）年纪相仿，诗人痖弦随军队去台时就只有17岁。白先勇的父亲亦在台湾所以他不能归入第一代，按照辈分只能是外省第二代，但与年纪相差近

20 岁的其他第二代相比，在年龄上显然又是两代人。

在台湾出生的第二代，其中也存在一些差异。到台湾时，有的夫妻同去，或者较早结婚，加之台湾当局鼓励，20 世纪 50 年代有一波生育高峰，这些孩子是第二代中的主体组成部分。但也有一些外省第一代一直等到“反攻大陆”无望后才结婚生子，年纪已大，孩子却小，60、70 年代出生的都有。虽然同属外省第二代，50 年代出生的第二代与 60 年代及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出生成长的环境差异造成了他们之间在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存在颇多不同，并不宜一概而论。朱天文在《带我去吧，月光》中，借由哥哥之口讲述过他与妹妹的不同，相差八岁的兄妹两人，正是早生与晚生的外省第二代的代表。哥哥佳柏经历过没有冰箱的日子，那时全村就一户人家有冰柜，暑假时三轮车送冰块来，孩子们围着车等冰块卸下抢碎冰碴，如果能抢到一块巴掌大的冰就乐歪了；佳柏当年还以开面店卖卤蛋为人生志愿，因为想让自己豪华地每天吃一个完整卤蛋，而不必等到请客那天，还分不到薄薄的两片。到了佳玮出生，家里条件已经宽裕起来，物质不虞匮乏，所以孩子们被养成“予取予求，手心向上的一代”^①。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还影响着两代人的处事方式与价值理念。佳柏这代人因为服兵役错过经济起飞，从当人家的部属一路辛苦混上来，他们自觉一切“都是自己打拼来的”。相较于佳柏他们的忍耐打拼，妹妹佳玮这代人却是“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下，难做的事，讨厌的事，超出吩咐以外的事，打死也不会主动去做。情绪又来得多，动辄要沟通，沟通”。^② 佳柏带有情绪因素的牢骚话语，并不能完全概括早生者与晚生者各自的复杂情状，却也点出了 50 年代出生者与 60 年代出生者一眼即明的差异。同样，在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外省第二代作家，也有社会发展所导致的代际差异，其创作风格与主题内涵都略有不同。

早生者与晚生者，一差十年，各有各的特色。晚生者有不可忽

① 朱天文：《带我去吧，月光》，《世纪末的华丽》，台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年版，第 116 页。

② 同上。

略的研究价值，早生者亦然。本书无意囊括所有外省第二代女作家，而主要选取 50 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为研究对象，尤以朱天心^①、朱天文^②、苏伟贞^③、平路^④、袁琼琼^⑤等几位作家为主。为了论述方便，并不另外命名，仍然沿用了“外省”的概念，但不采用这一概念在任何历史阶段衍生而出的其他内涵，只取其中的省籍含义。外省第二代女作家兼具外省与女性双重身份，在台湾社会转型期成长起来，共同面临身份认同、文化冲突、女性困境等议题，有其作为一个群体相似的应对策略，也有因个体经验的差异而生出的多元混音。本书力图将外省第二代女作家作为一个群体进行整体性研究，期望能进一步开拓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的研究视野。

① 朱天心（1958—），山东临朐人，生于台湾高雄。

② 朱天文（1956—），山东临朐人，生于台湾高雄。

③ 苏伟贞（1954—），广东番禺人，生于台湾台南。

④ 平路（1953—），原名路平，山东诸城人，生于台湾高雄。

⑤ 袁琼琼（1950—），笔名朱陵，四川眉山人，生于台湾新竹。

第一章 认同想象：以眷村 书写为中心

1945年台湾光复后，即开始出现从大陆到台湾的移民潮，这股移民潮在1949年国民党败势已定后达到顶峰。约莫120万移民短时间内集中涌入台湾，如何妥善安置这些移民，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些移民中约有一半是军人；所谓眷村，指的就是国民党为安置中下层官兵及其眷属所搭盖的军眷区。

军眷区并不仅见于台湾地区，大陆也有，只是习惯称之为军队大院或部队大院。不管是“眷村”还是“大院”，因为军队体系的特殊性，它们有着统一管理、封闭、自给自足等共通性。但台湾眷村因为特殊的形成原因与历史走向，已经成为台湾社会一处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景。

眷村依附军队而建，自20世纪50年代起，台湾从北到南有近九百处。眷村是在所谓“反共复国”的背景中建起来的，属于过渡性质，并无长久定居的打算，而且资金多是募集而来并不充裕，只能因陋就简。“眷村的建筑型态从最早接收日本人撤台后遗留的‘日式宿舍’、到蒋夫人与‘妇联会’筹建的大批连栋鱼骨式‘克难黑瓦平房’、四或五层楼公寓式的‘职务官舍’，以及更新老旧眷舍的十余层楼大型小区式的‘××新城’。从‘新村’到‘新城’，见证了几十年的眷村演变历程。”^①随着时势变迁，草草而就

^① 李俊贤：《眷村走透透》，张端主编《宝岛眷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60页。

的临时住所成了永远的家，异乡变为故乡。20世纪80年代后，眷村改建成“国宅”，面临被一一拆除的命运，却也得到了一个保护眷村文化陈迹的契机。

眷村是很多外省第二代“青少年时期的主要活动场所，在‘眷村’中经历、感受和体验到的一切，已成为他们人生经验、情感内涵的最重要部分，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思想、行为中。”^①进入文坛的外省第二代作家创作了极为丰富的眷村文学。文学，也是保存这一文化地景的重要手段之一，眷村将在文字中得以留存和重生。经过一甲子的光阴，眷村收纳了太多的人与事，加之台湾族群身份敏感，为眷村进入文学提供了无限的空间。眷村如此丰富多面，也正适于外省第二代女作家展开认同想象的书写。

第一节 眷村在文学中的位移

眷村，既是地理空间，也是文化空间。对于眷村人而言，眷村是家，既是物质的家，也是心灵的家。对出生于眷村的外省第二代女作家而言，眷村是丰富的创作资源。眷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界碑，它以不同的面貌，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活动在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的文字中，但位置不定，或有移动。

一 作为生活背景的眷村

很少有作家的文学创作完全不动用到个人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在创作初期，多数作家都会从最熟悉的生活入手，读者常常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作家个人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背景甚或人生经历。出生于眷村的外省第二代女作家也是如此，她们的文学创作如果完全跳脱眷村反而奇怪。

眷村最早出现在外省第二代女作家的创作中，往往只是单纯作

^① 刘俊：《从〈有缘千里〉到〈离开同方〉——论苏伟贞的眷村小说》，《暨南学报》2007年第4期。